



# 文言语法

## 研究集稿

WENYANYUYFA YANJIJIGAO

胡力文／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 文言文语法研究集稿

胡力文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文言语法研究集稿

胡力文著

- 
- 出版发行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德滨湖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6千字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62 - 450 - 928 - X/D · 44833
- 

定 价：人民币 25 元 港 币 25 元

奉贈

山東省圖書館

胡力文

二〇〇九年



## 目 录

先秦 s 之 p 主语句与 s-p 主语句的消长 .....	( 1 )
文言里具有特殊语义关系的双宾语结构 .....	( 7 )
谈文言复句结构 .....	(15)
成语中的文言特殊语法 .....	(22)
文言动词有无意动用法辨 .....	(35)
文言语法札记十则 .....	(40)
古今汉语短语比较 .....	(50)
《离骚》实词特殊用法 .....	(94)
《离骚》虚词论析 .....	(104)
《离骚》语法分析 .....	(130)
《韩非子》s-p 主语句式 .....	(179)
《韩非子》疑问词语谓语句式 .....	(185)
《韩非子》句首状语句式 .....	(193)
略说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设问题 .....	(205)
关于古汉语语法教学 .....	(211)
附录：	
反切的拼读与解释问题 .....	(230)
谈谈音训 .....	(245)
关于文言文读音的几个问题 .....	(253)
怎样借助古音韵知识进行声母辨正 .....	(264)
后记 .....	(273)

## 先秦 s 之 p 主语句与 s-p 主语句的消长

先秦汉语里 s 之 p 结构与 s-p 结构充当主语的状况,一些古汉语论著中通常的描写是:

“在古代汉语里,主谓词组作主语是不多见的,因为主谓词组作主语时,大都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个‘之’字,使主语降为定语。”(张静、张桁《古今汉语比较语法》第 296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甲骨文只有个别句子形式作主语,到了周秦,这类主语大量加多了。通常在它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上助词‘之’以取消它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整个句子的一个成分。”(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第 124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一是在先秦汉语里 s-p 结构作主语是否“不多见”,杨伯峻先生也认为“子句作为主语,这样的例子不多见”;<sup>①</sup>二是 s-p 结构作主语是否“大都”、“通常”要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上“之”。为了避免“大都”、“通常”之类的模糊估量,弄清先秦汉语中 s 之 p 主语句与 s-p 主语句的消长及其缘由,我们考察了《尚书》、《论语》、《国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与《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从对 768 个用例的剖析,我们认为先秦 s 之 p 主语句与 s-p 主语句的消长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殷商至战国前期,这一时期的《尚书》、《论语》、《国语》与《墨子》中出现 s 之 p 主语句 160 个, s-p 主语句 117 个。虽

<sup>①</sup> 见《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第 75 页,语文出版社 1992 年。

然两种主语句并行,但s之p主语句显然占优势。<sup>①</sup>

先秦汉语里,s之p主语句与s-p主语句具有基本相同的谓语句类型。例如:

(1)邦之贼,惟汝众。(《尚书·盘庚上》)

(2)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国语·晋语一》)

(3)善哉,子之言是。(《左传·昭公十六年》)

(4)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5)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墨子·鲁问》)

(6)物得其常曰乐极。(《国语·周语下》)

(7)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国语·晋语》)

(8)而子不对,何也?(《墨子·非儒下》)

例中的名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动词性谓语与疑问语词谓语,是两种主语句的基本谓语句类型。在上举四部典籍(不含《左传》)中,两种主语句的形容词性谓语有74例,占28%;动词性谓语有105例,占39%。它们是主要的谓语句类型。

s之p主语句与s-p主语句的语法配置应该说基本相同,那么,在主语位置上使用s之p结构与使用s-p结构有什么不同呢?先看下面三组句子:

第一组:(9)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10)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

第二组:(11)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国语·晋语四》)

(12)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国语·晋语三》)

第三组:(13)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墨子·非乐上》)

<sup>①</sup> 《左传》一书,据管燮初在《左传句法研究》中统计,主谓结构作主语共98例,其中包含s之p主语句与其p主语句。何乐士在《左传虚词研究》中统计,[主·之·谓]结构作主语共65例。可见,《左传》中s之p主语句占绝对优势。

(14)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墨子·尚同中》)

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语言材料单位,s-p 结构中间一加上“之”,便增强了主语的领有性,突出了谓语并使之成为语义重点,且带有一定指称性,如“丘之祷”中的“祷”不完全具有陈述性了,而已有某种程度的名化;作为语言运用单位,s 之 p 结构作主语,助词“之”具有纽带作用,其后有较大的顿宕,使 s 之 p 中的主语与其谓语在结构关系上显得更为紧凑。由于 s 之 p 结构充当主语具有特殊的表达能力与组合能力,因而在这一阶段 s 之 p 主语句使用频率相当高。

第二阶段是战国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与《韩非子》中共出现 s 之 p 主语句 183 个,s-p 主语句 308 个。从对两种主语句的对比考察,可以看到 s 之 p 主语句相对减少了,而 s-p 主语句明显增长了。“大都”、“通常”要在主语与谓语之间加“之”的说法,不符合这一时期的语言实际。

两种主语句的基本谓语类型在前后两个阶段的消长情况是:[名词性谓语]s 之 p 主语句中 31:22,s-p 主语句中 26:68;[形容词性谓语]s 之 p 主语句中 42:61,s-p 主语句中 20:59;[动词性谓语]s 之 p 主语句中 75:74,s-p 主语句中 42:115;[疑问词谓语]s 之 p 主语句中 7:18,s-p 主语句 23:51。从上举数据可以看出:s-p 主语句在战国中后期由不同谓语结构构成的句式均有较大增长;而 s 之 p 主语句名词性谓语句式明显地出现了负增长,动词性谓语句式也没有什么增长。

s-p 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在战国中后期,其范围扩大了,使用频率增高了。前一阶段的《尚书》等四部典籍中 s-p 主语句动词性谓语句式计 42 例,有特殊动词 12 个,出现频率为:“曰<sub>6</sub>”、“谓<sub>6</sub>”、“为<sub>8</sub>”、“云<sub>2</sub>”、“若<sub>4</sub>”、“如<sub>4</sub>”、“犹<sub>1</sub>”、“有<sub>2</sub>”、“在<sub>1</sub>”、“可<sub>5</sub>”、“祭<sub>2</sub>”、“害<sub>1</sub>”;而《孟子》、《庄子》、《荀子》与《韩非子》中计 115 例,有特殊动词 21 个,其出现频率为“曰<sub>20</sub>”、“谓<sub>32</sub>”、“为<sub>6</sub>”、“言<sub>1</sub>”、“若<sub>12</sub>”、

“如<sub>2</sub>”、“犹<sub>5</sub>”、“视<sub>3</sub>”、“过<sub>4</sub>”、“及<sub>1</sub>”、“有<sub>7</sub>”、“在<sub>3</sub>”、“无<sub>4</sub>”、“使<sub>3</sub>”、“可<sub>5</sub>”、“忘<sub>2</sub>”、“以<sub>1</sub>”、“服<sub>1</sub>”、“定<sub>1</sub>”、“休<sub>1</sub>”与“脱<sub>1</sub>”等。这些动词或表示分类,或表示比较,或表示存在,或表示使令,或表示心态,或表示原由等。它们都能充当 s-p 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因为都能以事件为陈述对象。

在战国中后期,为什么 s 之 p 主语句相对减少,而 s-p 主语句会得到较大发展呢?

首先是句法功能的渗透与类推,s-p 结构在先秦汉语里分布在谓语位置上比主语位置上的要多,以《左传》为例,据管燮初先生统计,主谓结构谓语有 252 个。《韩非子》中,据我们考察,主谓结构谓语出现了 289 个。既然 s-p 结构作谓语功能得到发展,那么,由于语法功能渗透类推,s-p 结构作主语的功能也自然会扩展。战国中后期,s-p 主语句于是得以快速增长。

其次是同义结构的比较与选择,s-p 结构与 s 之 p 结构可构成用义关系。例如:

(15a)我讳穷久矣。(《庄子·秋水》)

(15b)我之讳穷久矣。

(16a)甚矣吾衰也!(《论语·述而》)

(16b)甚矣吾之衰也!

(17a)吾穿井获狗,何也?(《国语·鲁语下》)

(17b)吾之穿井获狗,何也?

(18a)人主无贤,如瞽无相。(《荀子·成相》)

(18b)人主之无贤,如瞽之无相。

上举各例 s-p 主语与 s 之 p 主语构成了同义结构,可以互相转换。殷商至战国前期,s 之 p 主语句占优势,而战国中后期,s-p 主语句得以发展,这当然是为了适应社会交际与语言环境的需要,对同义结构进行社会习惯选择所造成的。

再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推动,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学术

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当然也推动了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交际的频繁,必然要求分布在主语位置上的句法结构能表达更复杂的意义。s-p 结构(句子形式)一般来说,比其他句法结构具有更大的意义容量,适应了社会交际中以事件为陈述主题的需要。例如:

(19)夫三季王之亡也宜。(《国语·晋语》)

(20)子事父宜。(《韩非子·解老》)

前例,加了“之”,显然突出强调了信息重点“亡”;而后例是把“子事父”作为一个事件整体加以评说的。又如:

(21)有是哉,子之迂也!(《论语·子路》)

(22)善哉,汝问!(《庄子·至乐》)

“子之迂”,主谓之间加了“之”,重点在“迂”;“汝问”却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评述对象的。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都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经济发展,战争频仍,外交纷繁与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等,促使先秦汉语得以快速发展。人们在频繁的交际中,以事件整体为主题的陈述、评说、描写、判断与质疑日渐增多。s-p 主语句在战国中后期得到更大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s-p 主语句在先秦汉语里并非“不多见”。先秦汉语中 s 之 p 主语句与 s-p 主语句虽然并行,但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消长态势:殷商至战国前期,s 之 p 主语句占优势;到了战国中后期,s-p 主语句由于种种原因得以快速增长,而 s 之 p 主语句相对地减少了。s 之 p 结构的衰落,应该说从战国中后期便可以窥见其机兆。

附表：先秦 s 之 p 主语句与 s-p 主语句出现频率统计

先秦典籍	谓语句类别 出现频率	名词谓 语	形容 词性 谓语	动 词 性 谓 语	疑 问 词 性 谓 语	主 谓 谓 语	代 词 谓 语	数 量 性 谓 语	总计
尚书	s 之 p	3		4					7
	s-p		1	2	2				5
论语	s 之 p	2	10	6				1	19
	s-p	1	6	6				1	14
国语	s 之 p	20	12	31	1	1		1	66
	s-p	25	8	18	18			3	72
墨子	s 之 p	6	20	34	6			2	68
	s-p	2	5	16	3				26
孟子	s 之 p	6	15	17	9	1		2	50
	s-p	6	5	28	9				48
庄子	s 之 p	4	19	12	2		1	1	39
	s-p	26	20	28	19	2	1	1	97
荀子	s 之 p	5	8	28	2			1	44
	s-p	24	13	23	8		6		74
韩非子	s 之 p	7	19	17	5	2			50
	s-p	12	21	36	15	2	2	1	89

## 文言里具有特殊语义关系的双宾语结构

文言中最常见的双宾语结构是具有“给予”义或“问取”义的动词所带的双宾结构，如“赐晏子酒”、“归孔子豚”、“告之悔”、“问夫子政”等。这是古今相同的双宾语句法结构。文言中有些及物动词带双宾语，其直接宾语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而间接宾语与动词之间具有特殊的语义关系。这类结构，我们称为具有特殊语义关系的双宾语结构，简称特殊双宾结构。

### 一、文言特殊双宾结构的主要类型

#### (一)使动双宾结构

使动词一般带一个宾语，有时可以带上两个宾语。例如：

(1)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左传·隐公元年》)

(2)是故使申生伐东山，衣之偏褻之衣，佩之以金玦。(《国语·晋语一》)

(3)吾欲辅重耳而入之晋，何如？(《韩非子·十过》)

(4)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王维《送别》)

(6)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司马光《赤壁之战》)

使动双宾结构中，动词与间接宾语之间具有使动关系，指人的间接宾语是施动者。“生民心”，使民生二心；“衣之偏褻之衣”，让他穿左右异色的衣服；“饮君酒”，使君饮酒，“失孤望”，使我失望。直接宾语表示“物”或“事”，乃是动作行为的支配对象。

#### (二)为动双宾结构

为动用法中的动词,有时也可以带两个宾语,构成为动双宾结构。例如:

(1)作僖公主者何?为僖公作主也。(《公羊传·文公二年》)

(2)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3)原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

(4)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贾谊《论积贮疏》)

(5)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薶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去私》)

(6)吾不忍为之民也。(《战国策·赵策》)

《公羊传》作者把“作僖公主”解释为“为僖公作主”,这对我们理解文言为动双宾结构的语义关系很有启发。这类双宾结构中,动词与间接宾语之间具有为动关系,隐含的介词“为”(如“为僖公作主”中的“为”在“作僖公主”中的“作僖公”间属隐含介词)可释为“给”、“替”,引进服务对象,或释为“因为”、“为了”,表示原因或目的。上举例中,“树之君”,给他们设置君主;“为之民”,给他当老百姓;“受之饥”,因为这事遭受饥饿。译为现代汉语时,要选用恰当介词与原间接宾语组成介宾短语,充当状语。

### (三)向动双宾结构

谓语动词同间接宾语之间构成向对关系,也就是说动作行为是“向”或“对”间接宾语而发的,直接宾语仍然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这就是向动双宾结构。例如:

(1)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荀子·富国》)

(2)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孟子·万章下》)

(3)夫田子将有大事,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韩非子·说林

上》)

(4)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 (《左传·成公二年》)

(5)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韩非子·内储说上》)

例中,“夺之财”,向他们夺财;“闭之门”,对他关门;“示之知微”,向他表明知道奥秘;“谓君何”,对国君说些什么;“言之君”,向国君讲这件事。前四例为“动词+间宾+直宾”格式,后一例为“动词+直宾+间宾”格式。

文言里为什么会这些特殊双宾结构呢?文言特殊双宾结构的形式,主要与文言动词的特殊用法有关。具有特殊用法的动词,往往带一个宾语,构成单宾结构;有时带上两个宾语,动词与间接宾语之间具有特殊语义关系,这便形成了特殊双宾语结构。这也是文言双宾结构比现代汉语双宾结构复杂的主要表现。

## 二、与“为之名”有关的问题

(一)“为之礼”、“为之箪食与肉”是不是为动双宾结构

(1)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左传·成公三年》)

(2)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左传·宣公二年》)

对上两例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作为动双宾结构,“重为之礼而归之”释为“很隆重地给他举行礼仪,并把他送回去了”,“为之箪食与肉”释为“给他预备一筐饭和肉”。<sup>①</sup> 一是认为“为”字含有授予意义,构成一般双宾语结构。“为之礼”是“送给他礼物”的意思,“为之箪食与肉”是“给他一筐饭与肉”。<sup>②</sup>

① 分别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第38页、第29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参见朱振家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15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丁贞蕻《古汉语“动+之+名”式的结构分析》,见《古汉语语法论集》第413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

这里值得研讨的问题是：首先，关于动词“为”的意义，及物动词“为”在文言里涵义非常广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可以把它理解为“做”、“造”、“当”、“安排”、“采取”、“举行”、“预备”、“设置”等等。当“为”带上双宾语，便同其它交与动词一样，含有其共同语义成分“给予”，但不要误解为动词“为”就是“给予”。朱德熙先生在《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一文中对共同语义成分“给予”所加的注解是：“这里的‘给予’指的是Da类动词所包含的语义成分，不是指‘给予’这个词本身”。其次，关于词、句的语义及结构分析同语境（包括上下文、历史背景等）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紧密结合语境。如“为之礼”中的“礼”在《左传》时代释为礼仪是恰当的，作为“礼物”讲是后起义。“为之箪食与肉”，朱振家主编《古代汉语》（上册）第48页解释为“给他预备一筐饭和肉。为：动词，给。”按译述，系为动双宾结构；按对动词“为”的释义，乃一般双宾结构。前后矛盾。孤立地看，动词“为”似乎可训为“给”，但联系下文“寘诸橐以与之”看，便显得于理不顺。据此，我们采取第一种看法。

## （二）关于“之”释为“为之”的争议

刘百顺先生曾指出：颜文归纳《马氏文通》意见的第三类“‘之’解为‘为之’，如‘为之君’。”是非常错误的。<sup>①</sup>“之”不能解作“为之”。《马氏文通》曾谈到“为之君”可解作“为之立君”，“则‘之’为司词矣”。可见，马氏并没有把“之”释为“为之”。刘文也提到“‘为之立君’的‘为’是用另一种句式表述‘为之君’的意思非加上去不可的介词（如把‘为之所’解为‘给她安排处所’的‘给’一样），并不是‘为之君’的‘之’本身包含的意思。”这话基本上对，还需要补充。关键是应看到动词与间接宾语之间具有为动关系，“为之君”中的“为之”里隐含介词“为”，译述时介词“为”便由隐性变为显性：“为

<sup>①</sup> 参见颜景常《古汉语中的“为之b”结构》，《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刘百顺《也谈“动之名”结构中的“之”》，《中国语文》1981年第5期；《马氏文通校注》上册第45页，中华书局，1954年。

之为(立)君”。也就是说,介词“为”是动词与间接宾语的语义关系所赋予的意义,并非“之”本身所具有的。“为之君”是为动双宾结构。

### 三、“夺之牛”、“夺之食”是单宾结构,还是双宾结构

先看几个“夺之名”例句:

(1)牵牛以蹶人之田,而夺之牛。(《左传·宣公十一年》)

(2)殄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殄,则不得食,则将殄之乎?  
(《孟子·告子下》)

(3)州吁果杀其君而夺之政。(《韩非子·内储说下》)

“夺之名”是单宾还是双宾结构,存有不同看法。<sup>①</sup>主张是单宾结构的论著所提出的理由,归结起来主要有:一是“夺”为“夺取”义,不能构成双宾语;二是“之”与后面的名词之间是领属关系;三是“之——名”不能离析。我们想对此逐一进行商讨。

首先,“夺取”义动词能否带双宾语问题

汉语双宾动词,有人称交接动词,它们是三向动词,可以带双宾语。典型句式是:S(主语)——V(双宾动词)——O<sub>1</sub>(间接宾语)——O<sub>2</sub>(直接宾语)。双宾动词主要分为“授与”类动词与“收受”类动词两大类。前者含有共同语义成分“给予”,V使O<sub>2</sub>由S向O<sub>1</sub>转移,“S”是事物的授与者;后者含有共同语义成分“取得”,V使O<sub>2</sub>由O<sub>1</sub>向S转移,S是事物的收受者。<sup>②</sup>“夺之牛”中的“夺”

① 主张是单宾结构的有:马国栋《“之”作“其”用小议》,《中国语文》1980年5期;刘百顺,见10页注;唐钰明《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丁贞英,见9页注;陈坤德、曹国安《试论古汉语双宾语的鉴别》,《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等。主张是双宾结构的有: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何乐士《先秦“动·之·名”双宾式中的“之”是否等于“其”?》,《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等。

② 参见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第404页至413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

属于“收受”类的三向动词,从语义上看,它是能够带双宾语的。

其次,“夺之名”中“之——名”之间具有领属关系,是否可以作为单宾结构的依据。

有人把“之——名”之间具有领属关系作为断定单宾结构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双宾动词中的“授与”类动词与“收受”类动词在句法、语义上还具有不相同的特征。朱德熙先生曾指出表示取得的双宾语格式里的“近宾语和远宾语之间在意义上有领属关系”<sup>①</sup>,范晓先生在《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一书中也指出:“接”类动词所联系的  $O_1$  与  $O_2$  多数能构成编正式“ $O_1$  的  $O_2$ ”,如“我收到他一封信”,“他”、“一封信”可构成“他的一封信”。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领属关系”属于语义层面,如果在  $O_1$  与  $O_2$  之间加上结构助词“的”就转化为句法层面的偏正结构,原来的双宾结构也就转化为单宾结构了。“夺之牛”、“夺之食”与“夺之政”中的“之——牛(食、政)”之间具有领属关系,这正体现了“收受”类双宾动词所构成的双宾结构在语义上的特征。因此,我们不能据以否定“夺之牛”等是双宾结构。

再次,关于“之——名”能否分离

主张单宾结构论者提出的另一根据是:“授之政”可变换为“授之以政”,而“夺之牛”不能借助介词“以”、“于”将动词后面的“之”与“牛”予以分离,即不能说成“夺之以牛”;“赐之食”等于“赐给他,赐给食物”,“夺之食”却不等于“夺他,夺食物”。

诚然,“夺之牛”不能转换为“夺之以牛”、“以牛夺之”,但这只能证明“夺之牛”不属于“授与”类双宾结构,而不能证明它不是双宾结构。因为可以借助介词“向”将“夺之名”中的“之——名”予以分离,“夺之牛”可转换为“向之夺牛”,“夺之政”可转换为“向之夺政”。这类双宾结构译述成现代汉语,间接宾语还可以放入“从

<sup>①</sup> 朱德熙《语法讲义》第117页至11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